

黃遵憲，晚清的改革先驅

1898年9月，清國為了革新自強而掀起的改革運動「戊戌變法」在守舊派的打擊下最終歸於失敗。包括譚嗣同在內的不少變法人士遭到殺害。康有為、梁啟超則被迫逃亡。與此同時，日本駐清國公使館出面與清政府交涉，促成營救了一位清國知名的官吏：黃遵憲。這一史實隨着近年的日本外交文書解密以及中日兩國的學術研究之深入而逐漸清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資料圖片

黃遵憲是晚清知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因為其詩歌創作方面的傑出成就，他有「嶺南才子」的美譽。祖籍廣東梅州的黃遵憲身處晚清的紛亂時局中，並沒有故步自封，而是在近代化的潮流中放眼世界，用自己手中的筆記錄下中國歷史上從未遭遇過的大變局，同時在實務中促進自己的國家革新自強、奮發向上，成為晚清改革的先驅。他一生的命運也成為了那一時代的中國歷史的寫照。

出使扶桑，致力思想啟蒙

傳統的文化中心主義觀念以及朝貢制度的心理影響，再加上國力和文化思想上的主動性和優勢，中國人在古代一直未有將日本視作一個與自身平起平坐的國家。作為早期先進國家的代表，日本對中國的仰慕，使得類似遣唐使這樣的群體層出不窮，將中國的文化、學術、思想甚至體制傳入日本，也促成過大化改新這樣的改革。但是，這一情形到了近代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隨着西方列強的到來，日本走上了開化革新的道路，在改革方面比當時的清國更加徹底。而傳統的中日關係也被打破。1871年，清、日兩國正式建立了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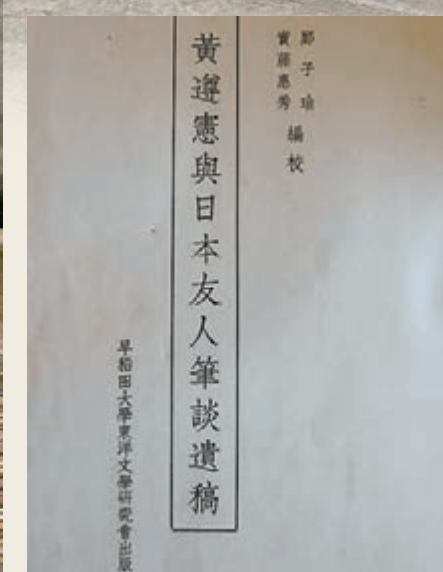
1877年，為了處理琉球問題，黃遵憲隨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成為了中國歷史上首位駐日的參贊。由於黃遵憲出色的外交才能，公使館日常的對日交涉事務實際上是由黃遵憲親自負責。此時的日本，已經是處於文明開化、不斷改革的明治維新歷史階段。身處這一重要的歷史時空中，黃遵憲不可能沒有反應。他細心記錄下了日本社會的變化與發展，最終完成了有數十萬字之多的名作《日本國志》。這是一部極為重要的著作，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系統化論



黃遵憲雕像



黃遵憲故居



記錄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的文獻。



中日兩國合作的學術成果記載了黃遵憲生平。

述、研究、分析日本的文獻，而且這一文獻是在近代化的歷史分岔路口中寫下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時代意義，更成為當時中國人認識日本的重要渠道。

為何寫下《日本國志》？黃遵憲曾說：「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談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以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換言之，中國人不了解日本，日本卻非常了解中國。而在這一著作中，黃遵憲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他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效法日本的改革，脫胎換骨、自立自強。

贏得東瀛朝野的高度評價

黃遵憲在日本擔任外交官期間，廣泛地結交日本各界人士。除了履行自己的公務職責之外，更着力在文化等多領域推動中日兩國之間的對話與交流。由於中

日兩國同為漢字國家，故此當時兩國不同人士之間的交流也是以筆談方式進行。黃遵憲在這一方面也不例外。1968年，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出版了《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獻，記錄了黃遵憲與日本各界人士以筆談的過程。或許，正是因為同為漢字國家的緣故，歷史上，中國人未有將日本語視為一種獨立的語言。甚至在清日兩國建交之後，清國駐日外交團前往日本上任時，竟然沒有日語翻譯而只有英語翻譯。但是黃遵憲透過對日本文化和語言的觀察，首次以「和文」一詞來指代日語，也成為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第一個將日語視為獨立語言的中國人。這種觀念不僅是語言學的跨越，更是思想與文化的深刻觀察，啟示國人更好地認識自己的鄰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出使日本期間，黃遵憲從當時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一直力促清日兩國的和平甚至結盟，以此應對來自西方列強的威脅。這種思想，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創始人小野梓提出的「三國連帶」（即清、日、韓三國同盟）具有某種共通性。1880年春，黃遵憲更與日本友人共同發起組織了「興亞會」，希望力促中日兩國的友好。整體而言，黃遵憲在日本，以其高尚的人格、卓越的漢學才華、敏銳的思考力，贏得了日本朝野的尊重，這為他後來獲得光緒皇帝的信任而擔任駐日公使埋下了伏筆。

未上任的駐日公使

黃遵憲一生的最高潮，乃是曾經獲任為清國駐日本公使。甲午一役，清國戰敗。改革成為了當時清國官民的共識。而變法圖強的最佳學習對象便是東洋日本。因此，清國官方的駐日本公使一職便顯得特別重要。

1898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廷頒發上諭正式任命黃遵憲為駐日本公使。這顯然是一次破格拔擢。光緒皇帝

在發出這一上諭的同日，亦催促黃遵憲盡快進京，其急切心情溢於言表。不僅如此，為了顯示對黃遵憲出使日本的重視，光緒皇帝甚至以親筆朱筆諭的方式加封黃遵憲的官銜。這一朱筆諭現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在朱筆諭中，光緒任命黃遵憲為頭等公使，這是鮮有的信任和期望。同時，光緒親筆寫下了致日本天皇的國書以表達變法維新的願望，並期待黃遵憲呈遞。同時，更派出了軍機大臣王文韶、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專門與日本駐清國公使館協商黃遵憲赴日事宜。

黃遵憲能夠獲得信賴擔任駐日公使，一方面是光緒皇帝對黃遵憲個人才華的肯定，希望透過黃遵憲的任職能夠學習到變法自強的經驗。另一方面，從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明治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清我公使館與總署往復文書目錄》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日本方面亦主動提出：希望清廷任命黃遵憲為駐日公使。這與黃遵憲早期駐日時獲得日本朝野的讚賞有巨大關聯。當然，思想一貫持維新立場的黃遵憲行將出使日本，也遭到了清廷保守派的抵制和反對。但這並沒有瓦解光緒皇帝的決心。

但黃遵憲還未有正式啟程，戊戌變法便已經失敗。因為倡導變法，人在上海的黃遵憲被拘禁在洋務局，守舊力量此時也對與維新派過從甚密的黃遵憲大加攻擊。基於黃遵憲所處的險境，日本公使館開始與清廷交涉進行營救。最終，黃遵憲得以保全回籍。這一史實被完整記錄在彼時日本公使館書記官中島雄的《往復文書目錄》中。而由中日兩國學者共同完成的學術成果《從東瀛皇居到紫禁城》亦對這一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確認。

黃遵憲的人生高潮也漸漸過去，這也為一個變法革新的時代號角畫上了休止符。他一生的經歷，成為了晚清政治的坐標，也寫就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理想與志向。雖然這種志向顯得悲苦與無奈。



中國的騎樓建築顯示了南洋華僑與故鄉的淵源，而為華僑爭取歸國者乃是黃遵憲。

衝破禁海政策的牢籠

禁海政策，是明朝以來直至清朝為了限制民眾與外國交往而實施的國策。在禁海政策之下，中國民眾與外部世界的貿易被隔斷。而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實施了這一政策，中國對外部世界發展的把握以及資訊的接收顯得越來越被動和滯後。當西方世界開始轟轟烈烈的產業革命時，中國社會與世界文明潮流逐漸脫節。可以說，所謂的閉關鎖國，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禁海政策的代稱。

在禁海政策之下，最為受到傷害的是沿海地區的居民。所以，沿海一帶的居民往往冒着被官府處罰的風險而與外部世界進行貿易往來。不僅如此，為了生活的需要，大量的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甚至海外地區進行謀生創業。但是，在當時的朝廷眼中，則將這些人視為是勾結外部匪寇的逆賊。因此，在海外的華僑一直無法回到自己的國家。這顯然已經與近代化以來的世界大勢漸趨違背。

黃遵憲擔任過駐舊金山總領事，也擔任過駐英國的參贊，更擔任過駐新加坡總領事。豐富的外交經驗讓他對華僑事務有着非常深刻和全面的見解。因此，他積極在海外協助當地華僑華人，幫助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最為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黃遵憲的手中，中國確立了華僑護照制度。1893年，經過黃



遵憲的不懈努力，清廷終於宣佈允許華僑回國並頒發護照，從此終結了禁海政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黃遵憲功不可沒。

文：徐全

沿海的砲台記錄了黃遵憲經歷的清朝近代化時期。

記者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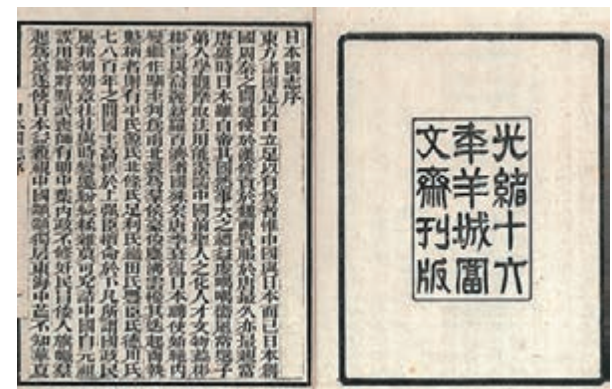
世代友好的友誼之橋

黃遵憲寫下《日本國志》之後，曾經將書稿交給了清廷當時非常重要的兩位洋務大臣李鴻章、張之洞進行審閱。二人對黃遵憲的著作以及展現出來的才華給予了高度評價。《日本國志》這一著作得到了此二人的隆重推薦。但是，這本書最終卻沒有能夠及時在當時的總理衙門獲得出版，被一直束之高閣到甲午戰爭之後。可見，當時清國的官僚政治已經腐化不堪到何種地步。

與早期的魏源、龔自珍不同，黃遵憲的開眼看世界具有強烈的實踐色彩。他在自己的公職生涯中盡力實現自身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他曾經在湖南推行過地方新政，試圖將改革落實到地方層面中。由此可見，黃遵憲從來不是一個空談家、空想家。

黃遵憲是一個贏得了日本尊重的中國人。他獲得尊重，乃是因為他傑出的外交才華、卓越的漢學造詣以及高尚的人格品質。這一切，奠定了黃遵憲在中日關係史中難以替代的地位。晚清時期的中國，也曾經有過追求建立國民國家的努力，但是最終失敗了。這種失敗，在黃遵憲個人的人生境遇中便可以尋覓到脈絡。但是，黃遵憲留給今人寶貴財富和精神遺產是不能夠被忽略的。他的著作也同樣是今天國人看待外部世界的重要文獻。對於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而言，民間與文化的交流也日漸密切，毫無疑問，黃遵憲也是世代友好的友誼橋樑。這一切，都值得今人銘記。

文：徐全



《日本國志》